

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形态及其内外驱动机制——以桂北地灵侗寨为例

□ 付静梅

[摘要] 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主要指村落的总体布局形式，其形态随时代发展发生变化。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人类聚居学、村落变迁等理论，关注侗族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规律及其驱动机制，发现在聚落形成最初，村落空间布局主要由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资源以及风俗习惯、传说等社会背景决定；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空间形态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驱动机制有“内生性推动力”如自然灾害、人口增长，以及“外源性拉动力”如政策制度、经济发展等因素。

[关键词] 侗寨聚落；空间格局；演变；驱动机制

侗族传统聚落是自然资源条件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复合型聚落景观，反映了侗族社会“特有的自然环境意识及社会文化背景，也与其长期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1]。随着时代发展，各种政策制度、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侗族聚落的空间布局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通过描述桂北地灵侗寨空间变迁的三个阶段，探讨乡村聚落空间布局演变的驱动机制，揭示村落空间的分布特点、动态迁移情况主要受自然资源与社会背景、“内生性推动力”以及“外源性拉动力”影响。

1 地灵侗寨空间格局演变的三个阶段

地灵村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西北部，隶属乐江乡，距乐江约20km，地理位置为：北纬25°55'~25°58'，东经109°05'~109°50'。该村东邻独镜村、乐江村；南与湖南城旋村、东江村接壤，西北部与湖南横溪村和本乡大雄村相连；北靠宝赠村^{[2]2-3}，是一个典型的侗族村寨。地灵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的第二大村落，全村总面积约24km²，共749户，总人口约3000人，主要姓氏有吴、粟、荣、伍等，其中吴、粟为村中大姓，约占该村总人口的80%。作为一个大行政村，地灵村共有21个村民小组，分三个自然村寨，分别是江头、大寨和八甲。地灵村内部各种设施完善，传统建筑如鼓楼、风雨桥、戏台，现代化建设如学校、文化综合楼、商业街等，均能较大程度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根据村寨内居民住宅区的团组变化情况以及人口迁

移规律，再结合田野调查过程中的访谈资料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地灵村的空间格局演变形态主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宋朝时期的发展阶段。根据雷崇提供的《四仔村稿》显示：北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地灵祖先侯通成、荣相人进入地灵；又根据吴德安提供的《四仔村八》显示：北宋天圣十年和北宋明道元年，“侯东子、文定良、王宗神从贵州龙独管东经芙蓉、临口、下乡、竹塘来到地灵”^{[2]65}。这一时期，两山环抱的地形地势以及水流等自然条件和习惯，围绕鼓楼居住的文化风俗以及建村传说等共同促成了地灵村最初的空间布局形态，即村落中、北部平缓的山坡以及平地区域为地灵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地势平坦的西南部以及东南部的山峦为稻作的水田、梯地以及林业种植的生产空间，西北部的山峦为村落的公共坟场。总的来说，地灵村和大多数传统侗寨一样，遵循着民居、公共建筑—池塘、水田—梯地—油茶、山林这样由内而外的空间布局形态。

清朝至改革开放时期发展阶段。从北宋到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由于地灵先民对这段历史没有任何记载，村寨内空间布局的具体情况因缺乏文献资料且年代久远而无从考证。从清朝至改革开放时期，地灵村民先后经历了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要历史事件，地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也随时代发展发生显著变化。不过由于地灵侗寨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不便的交通条件，村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很少对地灵产生影响，此阶段突发性灾害、人口增长等“内

生性”因素成为地灵村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力。这一时期，出于防火目的以及对更大居住面积的需求，地灵村约三分之一的村民从原居住地迁往东南部的山坡，扩大了原有的生活空间范围，生产空间则因新修住宅占地相应缩减。

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灵村也不例外。随着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实施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地灵村与外界的交往逐渐频繁，政策制度、市场化经济以及新思想文化等因素不断对地灵村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尤其在村落的空间格局变迁方面。这一时期，居住在村落东南山坡上的村民以及地灵大寨的一部分村民选择迁往村庄地势平坦的西南部，生活空间的中心逐渐往西南方向转移，地灵村也从原来的按血缘关系围绕鼓楼居住转变为现在的按地缘关系围绕公路居住，村落空间从原来的团状分布发展为现在的团状与带状相结合的空间布局形态。

2 地灵侗寨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

2.1 地灵侗寨空间格局的最初形态

“不同地域背景下产生的村寨聚落，其空间布局的最初形态是各种因素长期交汇的结果”^[1]，其中不仅包括自然资源条件如地质地貌、水文、气候，还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如风俗习惯、信仰、传说，它们共同影响着乡村聚落的选址和布局情况，进而影响村落最初的空间形态和规模大小。

侗族村落强调依山而建、傍水而居。地灵村位于越城岭山脉附近，村落东南部和西北部各有一条山梁，整个地灵村被两大山脉所环抱；同时，村寨周边又有许多溪流，东侧东北—西南流向的溪河发源于江头寨，流至下游时与西侧北—南流向的溪河汇合，在寨前交汇形成地灵河，最终向西南方向流去。由此可见，地灵侗寨坐落于两山环绕的小盆地内，其间不仅有天然的山体作为屏障，还靠近水源。位于山间盆地内的地灵村，受地形地势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主要聚集在村落中、北部平缓的山坡以及平地区域，民居、鼓楼、石坪、戏台、水井等主要分布在这一片；生产空间集中分在地势稍平坦的西南以及东南部的山梁，平坦地段是稻作的水田，山梁低处是梯地，高处是油茶和林场种植地；西北部的山梁则作为地灵村的公共坟场，供全村使用。

以上空间布局形态，还受风俗、传说的影响。在侗族历史上，人们习惯围绕鼓楼居住。从空间布局来看，

地灵村的鼓楼主要分布在大寨，因此村中的民居也主要聚集在大寨，村民的社交、娱乐等活动主要围绕这一区域展开。此外，地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还与建村传说有关。据村中老人讲，地灵的祖先来到此地后，将3件新衣服分别埋在了高端、下端和一条平缓山坡上。三年后进行查看时，祖先发现埋在山坡的衣服完整如新，于是判断这个地方属于阳地，适合居住；埋在高端的衣服腐烂了，祖先判断这个地方属于阴地；埋在下端的衣服则毫无变化。于是，地灵祖先把中、北部的平缓山坡作为村寨的住宅所在地，即现在的地灵大寨；把西北方向的高端作为坟场使用；下端则被作为生产空间，即现在村落南部平缓地段的水田和山峦地带的梯地、林场。

2.2 “内生性推动力”引发村落空间布局变化

当村落空间的最初格局形成后，其形态会随时代发展发生变化。由于地灵侗寨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不便的交通条件，村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很少对地灵产生影响，在此情形下，地灵村空间形态变迁的主要驱动力为“内生性推动力”。这一阶段，因火灾和人口增长、核心家庭小户化导致的住房紧张等问题促使地灵侗寨的空间格局逐渐改变，尤其是生活空间不断扩大，这一时期地灵村约三分之一的居民迁往东南部的山坡。

侗族的民居和公共建筑多为全木材质，且安放有火塘，因此侗族村寨发生火灾较为频繁，加上侗族喜聚族而居，同一族姓的住户多围绕鼓楼挨家挨户地紧密分布，一旦发生大型火灾，村中受牵连面积较大，侗族村寨的空间布局形态也会因此发生较大的变化。据《龙胜地灵侗寨史记》记载，地灵村历史上最大的火灾发生在1941年，“当时全村男人绝大部分都被征去桂林秧塘修建飞机场，在家的只有妇女和小孩，加上是午夜失火，房屋修建甚密，无法抢救”^{[2]324}，此次大火烧去地灵大寨300余户房屋，受灾村民的钱财、粮食、家禽家畜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全部被烧毁，灾后人们集体迁往横楼；而在1942年，横楼又发生火灾，此次大火共烧毁30余户房屋。这两次大火因火势的盛大以及连续性，给地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造成了很大影响。

除此之外，因人口增长、核心家庭小户化导致的住房紧张以及房屋分布过密导致的采光不好等问题也使得地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发生变化，尤其是生活空间不断扩大。随着社会向前发展，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地灵村的人口数量也出现了增幅，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口较少往外流动，因此地灵村原有的生活空间无法满足新增人口的居住需求，为了追求更舒适的居住环境，人们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桂北侗族村寨公共空间的文化与变迁研究”（编号：XYCSR2020030）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付静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开始寻找新的居住空间。考虑到西北方向的山地为村庄的公共坟场,不适合作为居住用地,故在1981年,地灵村约240户村民集体迁往东南部的山坡,依山就势修建起许多新的干栏式民居。

2.3 “外源性拉动力”促成村落空间形态的新一轮演变

改革开放后,外界的因素逐渐对地灵产生影响,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地灵村与外界的交往逐渐频繁,这一时期,“外源性拉动力”成为地灵村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在政策制度、外界市场经济以及新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居住在村落东南山坡的村民以及地灵大寨的一部分村民逐渐迁往村庄地势平缓的西南部,促成地灵侗寨新一轮的空间格局演变。

自1994年起,地灵村在国家的帮扶下开始修路,目前村中共有三条平坦开阔的公路:一条是平西公路湖南东江至地灵路段,1996年开通,主要通往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城以及湖南通道等地;一条是乐西公路地灵至宝赠路段,1999年开通;一条是乐西公路乐江至地灵路段,为该村的主干道,2005年开通。随着公路的开通,地灵村与邻近村寨、乡镇、市区以及省际交往、交流逐渐频繁,外界的市场经济以及文化思想等因素逐渐对地灵村产生重要影响。

公路开通后,一方面,在政府扶贫政策的引导下,不断有村民搬迁至公路两旁,尤其是前一阶段迁往东南山坡的村民,由于居住的分散以及出行的不便,这一阶段几乎都迁至公路两旁;另一方面,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地灵村与外界的交往增多,往日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被打破,市场经济的销售模式进入地灵村,在下寨公路两旁(村落地势平坦的西南部)逐渐形成一条繁荣的商业街。随着商业街的日渐繁荣,再加上交通便利等优势,下寨公路两旁反之又吸引了更多的村民从原居住地迁往地势平坦的西南部。同时,在外务工的村民回到地灵村修建新房时,由于长期在外生活,对于本民族聚族而居的传统观念不再看重,更追求居住环境的舒适性,

因此他们多选择在靠近商业街的公路两旁修建新房。这样一来,地灵村的空间布局形态便在原来的基础上沿公路不断往地势平坦的西南方向延伸,使村落空间从最初的团状分布发展为现在的团状与带状相结合的空间布局形态。

3 结语

乡村聚落作为“地球表面的特殊景观,其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现象”^[3]。但空间不是纯粹地理学上的概念,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密切相关,同时空间“并非自然的、静止的,而是变动不居的”^[4],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形态也随之改变。在聚落形成最初,村落空间的布局形态主要由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资源以及风俗习惯、信仰等社会背景决定。此后,由于侗寨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不便的交通条件,与外界长期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寨内村民的人际交往范围多限于本村,在此情形下,村落空间形态发生变迁的主要驱动力为“内生性推动力”,如自然灾害和因人口增长、核心家庭小户化导致的住房紧张等。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交通条件改善,村落与外界的交往逐渐频繁,这一时期,“外源性拉动力”,如政策制度、外界市场经济以及新思想文化等成为村落空间布局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使村落空间布局逐渐呈不均衡发展态势。总之,乡村聚落作为“广大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3],关注并把握其空间格局演变的规律及驱动机制,对村落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徐贲丽.空间生产与民族文化的内在逻辑——以侗寨聚落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4):74-80.
- [2]《龙胜地灵侗寨史记》编委.龙胜地灵侗寨史记[M].桂林:龙胜地灵侗寨史记编委,2007.
- [3]海贝贝,李小建.1990年以来我国乡村聚落空间特征研究评述[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3(6):635-642.
- [4]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社会,2006(2):34-48.